

事先合谋,借参与“跑分”之机,设局劫取涉案电诈资金——

“跑分”团伙内凌晨上演无间道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吉静静 玄晓霞



办案组在研讨案件。

成几次小额刷单并获得返现后,华先生在客服诱导下开始大额垫付充值,且不断加大投入。然而,到了最后提现时,华先生却发现本金和佣金都无法提出。

公安机关顺着资金流向展开侦查工作,发现华先生被骗的115万余元资金中有50万元通过刷POS机被转移至马某的卡中,且POS机绑定的多家商户注册人均均为马某,由此将马某锁定为犯罪嫌疑人。

2024年7月5日,马某被抓获归案。警方针对转入马某卡中被害人被骗资金的去向,加大讯问力度,意外发现马某涉及多起案件。他不仅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伙同他人导演了一起抢劫案。根据马某供述,警方锁定了同案犯杜某、张某、方某和张某军,并通过侦查摸排,于同年7月至9月将4人先后抓获归案。

里应外合上演抢劫戏

马某交代,2024年3月,他在安徽老家的棋牌室结识了杜某。同年5月,他在明知出借银行卡给他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情况下,仍在杜某的召集下来到湖北仙桃,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帮助电诈人员转账。经查,马某名下的银行卡涉及资金流水98.8万余元,其中62.8万元是电诈赃款,华先生被骗的115万余元中的50万元便是转入这张卡。

以往在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中,像马某这样的“卡农”(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主要赚取的是佣金。然而,纠集马某的杜某却不满足于此。“他说我提供银行卡‘跑分’时,卡内会收到钱。银行卡转账取款每天有限额,所以当天会剩下一些。这时他带人冲到‘跑分’的地方,把这笔钱‘黑’掉,再把卡里剩下的钱分掉。”马某交代,杜某当时分析称,由于“跑分”的钱原本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黑钱”,对方必然不敢报警。想着有利可图,马某便答应加入其中。杜某给马某配备了儿童电话手表,里应外合时方便定位。

5月31日,马某便依照杜某安排,赶赴湖北,加入了“跑分”团伙。当日在某小区楼房内,“跑分”团伙成员将马某的身份证、银行卡收走,用马某的信息办理多台POS机后,将马某看管在房间内,禁止其随意出入。下午,马某的银行卡内便开始有资金进账。晚上11点,身在国外的杜某及伙伙张某开始与马某联系,询问其具体位置及看守情况。

6月1日凌晨3点,杜某、张某及其

找来的帮手方某、张某军根据儿童电话手表的定位来到马某所在房间门外。按照先前约定,马某猛烈咳嗽向门外发出信号,杜某、张某等人随即掏出撬棍破门而入。他们身着便装,头戴写有“保安”字样的鸭舌帽,手持剪刀和撬棍,进门后大吼:“都蹲下,别动!”张某还假装打电话称:“张队,人都被我们控制了。”此时,“跑分”团伙成员以为对方是便衣警察,都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

接着,张某手拿撬棍逐一盘问马某和另两个“卡农”。为了演得逼真,问到马某时,张某还扇了马某两个耳光,并检查其余两个“卡农”的账户余额。随后,在“跑分”团伙看管人员的注视下,马某和另外两个“卡农”被杜某、张某带离现场,上了一辆车。

为了将戏做全,张某等人将车直接开到了仙桃市公安局门口,停留了好一会,将两个“卡农”放离,才连夜赶回安徽六安。

此后,张某、杜某、方某、张某军抢走另两个“卡农”账户内用于“跑分”的1万余元人民币,并在接下来的五日内分批将马某卡内剩余的31万余元人民币通过转账、取现的方式套现。其中,马某分得好处费7万元。截至案发,张某、杜某、马某、方某、张某军已将分得的钱款挥霍一空。

涉案人员均被判刑

2024年8月1日,警方将马某涉嫌抢劫罪一案移送江阳市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杜某、张某、方某、张某军因涉嫌抢劫罪于2024年7月至9月被警方移送该院审查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该案系张某、杜某伙同马某、方某、张某军为牟取非法利益,经事先合谋,借参与“跑分”之机,设局劫取涉案电诈资金。

由于马某和参与抢劫的张某、杜某、方某、张某军等人相互协作,分工明确,属于共同犯罪。审查逮捕期间,承办检察官按照先分类定性后分层处理的思路,仔细甄别参与人的行为作用与情节,依法分类分层处理:同年8月至9月,对张某、杜某、马某、张某军依法批捕,对方某采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

批捕张某、杜某、马某后,承办检察官围绕抢劫罪当场使用暴力和当场劫取财物的定罪关键,继续引导公安机关讯问“跑分”团伙看管人员、小区房主等,查明其被暴力压制不敢反抗等细节,及时固定关键证据,为后续精准定性做好铺垫。

经查,张某、杜某伙同他人以暴力手段多次劫取财物,数额巨大;伙同他人秘密窃取财物,数额巨大;伙同他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确已构成抢劫罪、盗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马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伙同他人以暴力手段劫取财物,数额巨大,构成抢劫罪。方某、张某军伙同他人以暴力手段劫取财物,数额巨大,构成抢劫罪。

2024年11月至今年10月,经江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抢劫罪、盗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张某、杜某有期徒刑十二年至十一年不等,各并处罚金6.3万元至5.8万元不等;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2.3万元。张某军、方某因犯抢劫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至三年九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2万元至1.5万元不等。5人均未上诉。

不履行赔偿义务怎能算“确有悔改表现”？ 河南鹤壁:强化对减刑全链条监督和实质性审查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何芳莉 王洪贵) 日前,经检察机关监督,不如实报告民事赔偿义务企图蒙混过关获得减刑的罪犯王某,被法院裁定不予减刑。

2022年11月,罪犯王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2023年2月,王某入河南省鹤壁市监狱服刑。入监以来,因表现较好,王某四次获得表扬。2025年8月15日,监狱对王某提请减刑八个月。

8月16日,鹤壁市检察院驻狱检察官对监狱移送的提请减刑卷宗依法进行审查。在审查判决书时,检察官发现,王某驾车两次故意撞击被害人,致被害人左踝重伤二级、左足损伤为八级伤残和左踝损伤为九级伤残。而该刑事判决书并无财产性判项,也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同时,提请减刑的卷宗材料中没有能够证明民事赔偿的材料,王某的认罪悔过书和罪犯个人改造总结及规划上,也写着“本人无任何附加刑”。

“被害人遭受如此严重的伤害,怎么没主张民事赔偿呢?”检察官对此感到疑惑。于是,检察官先向狱警询问,得知前期监狱也曾对民事赔偿情况进行核查,但并未查到。

检察官和狱警又向王某核实,王某也表示没有需要履行的民事赔偿义务。而王某对民事赔偿义务是否知情,是否如实报告,直接影响其是否具有“确有悔改表现”这一减刑要件。

因卷宗中没有相关材料,检察官在法官的配合下,联系原刑事案件承办人,查询到被害人曾在王某服刑后单独提起了民事诉讼。2023年10月26日,法院判决王某承担赔偿19万余元费用。

查询到民事判决书后,检察官再次认真听了王某入狱以来20余次会见、10余次亲情通话共计600多分钟的录音。经一一甄别,最终确定王某在会见其近亲属时,同意聘请诉讼代理人代为诉讼,且在2023年11月会见其妻子时,已被告知判决结果及需要赔偿的数额。

鉴于王某在核查、开庭阶段不如实报告且未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狱内存在消费较高等情况,检察官审查后认为,王某的行为违背悔改表现的实质要求,建议法院裁定不予减刑。2025年11月29日,法院裁定不予减刑。

针对监狱对财产性判项履行核查不到位等问题,2025年11月27日,鹤壁市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监狱提升实质性审查能力,常态化开展民事赔偿义务履行核查工作。同时,针对减刑联动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信息不到位等情况,该院与法院、监狱建立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信息共享核查机制,实现了罪犯民事赔偿执行情况动态同步共享。

海关总署原党委委员、副署长 孙玉宁受贿案一审宣判 收受财物5072万余元 获刑十三年

新华社合肥12月10日电 2025年12月1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海关总署原党委委员、副署长孙玉宁受贿案,对被告人孙玉宁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对追缴在案的孙玉宁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4年,被告人孙玉宁利用担任长春海关党组成员、副关长,满洲里海关党组书记、关长,郑州海关党组书记、关长,大连海关党组(委)副书记、关长,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副署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晋升、转业安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072万余元。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玉宁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大部分已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玉宁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玉宁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上接第一版)

为开放前沿装上“法治安全锁”

“封关运作”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将迈入全新的海关监管阶段:全岛将成为“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管理制度。

简言之,“‘一线’放开”,指海南与境外之间货物、资金等流动更加自由便利;“‘二线’管住”,指海南与内地之间设立高效精准的监管环节;“岛内自由”,则意味着在海南全岛,各类要素可依法有序自由流通。

这一根本性转变,旨在推动海南实现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扩大开放,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2024年3月,一批来自疫区的冻品企图通过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样板间”——洋浦经济开发区悄然入境,被执法部门当场截获。

涉案人员作案手段周密:提前销毁交易记录、拆除船只定位装置、订立攻守同盟,到案后更是集体沉默,导致案件初期陷入僵局。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侦查机关转变思路,将突破口转向隐蔽的资金流向。通过对涉案账户网络的逐层穿透,清晰的赃款流转路径逐渐浮现,与现场查获的27.8吨冻品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牢固的证据闭环。

在海口,一起特大成品油走私案同样考验司法智慧——涉案团伙众多、关系盘根错节。海口市检察院及时引导侦查取证,从现场查获的单个航次入手,逐步揭开了涉及13个航次的完整链条,系统查明从境外购油到境内贩油的各环节犯罪事实。

“在打击重大走私犯罪中,检察机关的依法介入与专业引导至关重要。”海口海关缉私局法制处副科长王运达深有感触,“通过数据共享、联合研判、线索移交等机制,我们形成了打击合力,办案质效显著提升。”

法治既有雷霆之力,亦含春风之暖。在冻品走私案里,15名涉案人员角色各异。检察机关细致分区:8名组织者被依法起

诉,3名证据存疑者获得不起诉决定,另有2名劳务人员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被法定不起诉。在成品油走私案中,面对19名外籍船员,检察机关对6名组织者依法批捕,对13名情节轻微者建议不予追究,并通过专业翻译、意见沟通保障其合法权益。

办案的意义不止于惩治。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监管短板,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市两地检察院机关深入开展调研,向主管部门精准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构建智能监控网络,强化执法联动,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系统治理的效能延伸。

此外,海口市检察机关推动构建环北部湾—琼州海峡区域反走私协作格局,联合广西南宁、广东湛江两地检察机关签署《关于建立琼桂粤地区三市检察院反走私司法协作机制的意见》,筑牢跨区域反走私防线。同时,自主研发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以数字赋能提升监督主动性、精准度。

以法治“硬措施”优化营商环境“软环境”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依然感到后怕。”见到鲍瑞时,她正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示范区内的检察院服务点咨询。面对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几位熟悉的检察官,她由衷说道,“多亏了你们的专业指导,让我们真正学会了如何守住企业的‘生命线’。”

鲍瑞是一家企业的商务部总经理。几年前,她所在的公司曾遭遇一桩商业秘密侵权案。当时,外贸部经理张某掌握了包括客户信息、市场需求在内的核心资源,以其丈夫名义注册同行公司,充当“中间商”,利用原公司客户资源在7个月内非法获利110余万元。

张某被抓后,侦查机关却面临定性难题:这些信息能否被认定为商业秘密?琼山区检察院应邀依法介入,引导侦查机关通过审查劳动合同保密条款、调取电子证据、委托专业鉴定等一系列工作,最终确认涉案客户信息具有商业秘密属性,为案

件下一步顺利办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将认罪认罚与追赃挽损有机结合,通过多次释法说理,促使张某自愿认罪认罚,主动向被害单位赔偿50万元,并获得对方谅解。最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40万元,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

让企业安心经营,既要保护无形资产,也要筑牢有形的安全防线。在洋浦经济开发区这个千亿元级化工园区,安全生产是不容失守的底线。

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打造“洋帆·益安”品牌,聚焦园区安全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2023年以来,针对发现的社会车辆违规入园、无人机擅闯园区、危化品监管标识缺失等隐患,依法向有关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安全生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检察机关的监督,为这份责任增添了法治保障。”儋州市应急管理局危化科主管黄岩松介绍,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局迅速行动,通过新增限高标识、统筹划定危化品运输专用车道等措施,进一步织密了园区的安全防护网。

企业的感受同样直接。“在检察机关建议下,我们迅速完成了所属84条管道的介质流向标识整改工作。”洋浦控股管廊公司资产管理科符庆欢说,“检察院的监督,让我们多了一双发现风险的‘眼睛’。”

这是检察机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求的生动实践。记者了解到,针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面临的金融风险和挑战,海口市检察机关与海口市金融办签订了《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协作机制(试行)》,助推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筑牢自贸港发展的绿色基底

当晨光透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层层绿荫,管护员李洪标如常踏上巡护的

小路。在一株高大的桫欏前,他停下脚步,轻抚树干上悬挂的标识牌,声音沉稳而坚定:“现在每棵重点保护植物都有了专属‘身份证’,我们的守护目标更明确,肩上的责任也更清晰了。”

这块看似寻常的标识牌,不仅记录着一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基本信息,更见证了一场生态司法保护从“治已病”到“防未病”的深刻变革。

而这处“国宝”,也曾面临险境。几年前,某建设工程公司在承建“雨林栈道—石白溪步道”项目时,因施工管理不当,损毁了包括3株桫欏在内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并未止步于追究直接责任,而是深入剖析案件背后暴露出的系统性生态保护短板,依法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建立源头治理机制。

“这份建议切中要害,发人深省。”海南热带雨林吊罗山(黎母山)国家公园资源管理部部长梁远鹏坦言,“‘国家公园’的‘国家’二字,代表着最高标准与最严要求。”以案促改,管理方迅速建立起从项目选址、施工监管到生态修复的全链条责任体系。如今,园内20余种珍稀植物均已挂牌保护,实现从粗放管理到精准守护的跃升。

近年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探索建立了热带雨林生态检察综合履职机制,由生态检察官统一办理环境资源类案件,同时创建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数字检察综合监督模型”,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生态保护案件。

目光从青山转向碧海。距三亚海岸仅3公里的东罗岛,曾因企业长期违规开发导致生态受损,违法行为经多次行政处罚后仍未停止。三亚市城郊检察院接到线索后,组织干警多次登岛调查,随后向3家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积极推动建立跨

部门整改协作机制。

“检察建议对我们而言,是带着司法温度的‘诊断书’和‘施工图’,这片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在稳步恢复。”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域海岛科工作人员黎运品表示,在检察机关的持续监督推动下,东罗岛上的违建已被依法拆除,相关企业投入147万元设立生态修复基金。如今,岛上累计补植苗木3400株,海底“造林”投放珊瑚苗4326株,放流贝苗126万粒,蔚蓝深处重现生机。

陆海统筹,生态治理的闭环在海岸线上同样清晰展现。曾几何时,三亚马岭社区因污水管网缺失,每天有近8000名居民的生活污水直排入海,200米海岸线海水泛黑。三亚市检察院通过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地方政府规划建设污水收集系统。

“检察建议促使我们启动红塘湾水质净化厂主管网工程,这才是治本之策。”三亚市住建局城市管理服务中心排水科负责人杨露略介绍,如今,日常巡查机制已常态化运行,守护着这片海湾的长治久清。

守护新质生产力“源头活水”

“南繁”,是中国农业科研的一项独特实践。科研人员利用海南得天厚的气候条件,将育种材料冬季迁至此处加代繁殖,以此显著缩短育种周期。

位于三亚的崖州湾科技城,是承载国家“南繁硅谷”战略的核心平台。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此考察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种子,正是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芯片”。

然而,高价值的种质资源也引来了窃密与觊觎。2022年底,A公司发现,其精心培育的数千瓶珍稀稀夏药苗,似乎被人“调了包”。调查揭示,此前寻求合作未果的B公司,通过利益输送买通了A公司内部人员朱某,将正处培育关键期的药苗,秘密替换为空瓶。得手后,这批被窃的“活体科研成果”被多次转移、隐匿,踪迹难寻。